

【国史讲座】

##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

沙健孙

【摘要】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衡量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应当是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5)01-0103-13

### 一、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使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私有制社会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人民政权，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采取人民政权自上而下的领导、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这种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把它称作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理论界、史学界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一些人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例如：有人提出，既然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那么，当年对它们进行改造是不是有必要？既然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看起来似乎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差不多，那么，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复归呢？还有人提出，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结果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没有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配合，这是不是在实际上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呢？还有人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1]</sup>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早产儿，苏联的垮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这样。中国搞改革，实际上不过是要补所缺的资本主义这一课而已。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进行思考并加以回答

【讲座日期】2004-10-21

【主讲人简介】沙健孙，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1。

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第一,这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决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否定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样一来,就一切都谈不上了,半个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都会被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了。

第二,这关系到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国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否定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根本谈不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了,因为党的基本路线不是别的,正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三,这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也就否定了在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根据。这样一来,改革要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就会成为问题。由此,各种私有化、自由化的思潮就会泛滥起来,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会难以坚持了。

正因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对此是不能不认真地讨论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历来是给予高度评价的。邓小平说过:“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急了一些。”<sup>[2]</sup>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胜利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是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次作出的明确肯定。我认为,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评价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应当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去论证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答复人们对此所提出的质疑和进行的责难。下面,我想对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为了保持论证的完整性,有的地方我不得不重复自己在以往所写的有关文章中的若干论点和材料,这是事先应当说明的。

## 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从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从世界历史上看，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美、日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是走通了的。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搞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这个事实，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1952年币值）。它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难免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还有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像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已经丧失了。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sup>[3]</sup>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胡乔木在1989年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正是从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的。他指出，决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有以下四个基本因素：第一，“中国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关键”。因为经验表明，“一定程度的统一计划性，以及拥有相应的物质手段或宏观调控能力，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始终是必要的”。第二，“中国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主要是由国营经济承担的，这当然需要大大扩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第三，“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它不可能成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主要依靠。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第四，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据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sup>[4]</sup>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没有论述农业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恰恰是党和国家为推进工业化的事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而又必需的抉择。因为这样做，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一户10来亩，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

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户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为52.3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等,都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的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会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是在1955年下半年掀起合作化高潮的。以下两条材料对于我们理解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当时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很有帮助。

其一,陈云在1956年4月应邀访问越南时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等人的谈话。陈云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是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五十元,西北每亩七八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一亿亩,投入五十亿元,产量以每亩二百斤算,不过二百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sup>[5]</sup>

其二,毛泽东于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1955年上半年那种“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的情况。他说:那个时期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种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那些当了县区乡干部的党员,他们煽起一些农民,本来是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种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由于破除了种种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以上材料表明:中共中央作出的大搞农业合作化的决策,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农村状况及农业增产途径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搞合作化以增产粮食,从而适应国家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考虑的。大家知道,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期,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造,鸟的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能腾飞起来。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赞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的这种新的主张,是适应形势的发展而提出的正确指导方针,即在认识上的一次与时俱进呢?还是对原有的正确的指导方针的背离,即在认识上的一种倒退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因为如果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把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个直接的任务提出来就是不正确的;如果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具有过渡性,即它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把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个直接的任务提出来,就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全国胜利前夕,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进行过分析。在这之前,不仅张闻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这种提法。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sup>[6]</sup>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sup>[7]</sup>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并且提出,“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sup>[6](p 146)]</sup>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全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实际上已经是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了,因为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担负着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这个主要矛盾的任务。决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着重规定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因为决议提出的要加以发展的合作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正是把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形式。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的条文中也有相适应的规定。比如,第31条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第34条规定,“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诚然,纲领并没有把“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过渡”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出来。对此,周恩来在当时就指出,“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sup>[8]</sup>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开始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没收官僚资本,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

——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第二，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使之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比如，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比如，工业方面，1949年国营占33.4%，私营占62.7%；1952年，国营已占50%，私营降为42%。第三，土改以后，个体农民已经开始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及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确实具有过渡性，它确实是处在“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状况。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提出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在提出总路线的时候，党进一步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sup>[9]</sup>正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的性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妥当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曾经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稿上，原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他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他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sup>[10]</sup>

实际上，在周恩来的政协报告稿之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于1951年4月9日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就曾经出现过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种提法。为此，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11日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电报中指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认为这段文字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sup>[11]</sup>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最早见于1951年3月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报告。<sup>[12]</sup>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统一过程，薄一波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他指出：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他认为，“毛主席是对的。因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要加以“确立”、“巩固”的确很难。“所以，当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了‘确立’的观点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

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sup>[13]</sup>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作了深入的论证，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说法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说，或许有人想能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现状永远保存下去，不要改变，从而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呢？答复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说法，正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还应当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想要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纯粹是幻想。如果还有人不愿抛弃并且坚持这种幻想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sup>[12](pp. 143~144)</sup>

#### 四、由于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是有激烈争论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和俄国孟什维克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就是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作为唯一的论据来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俄国搞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认为，由于俄国的农业还占优势，工业也刚刚拥有就整个说来很少受过训练的工人阶级，“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根本够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考茨基认为，俄国在民主革命之后，必须“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只有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成熟起来”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种观点在孟什维克内部占统治地位。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个别人（如加米涅夫）也认为，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是不宜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映。陈独秀也是依照类似的根据，认定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后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的认识根源。今天，某些人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所依据的也是类似的理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革命前提条件的论述，因为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否定性的回答，正是以引证马克思、列宁的有关思想作为立论根据的。

的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过“两个决不会”的论点。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论点理解为，只要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停滞和倒退，资本主义制度就决不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就决不当发生。因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自身就具有向前发展的能力。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末期，许多国家的生产力也并没有绝对的停滞或倒退。即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情况，在一个时期里也曾经是如此。实际上，马克思在提

出“两个决不会”论点的同时,他还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sup>[1](pp.32~33)</sup>这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的时候,如果具备了相应的其他条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就会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的历史成了世界历史。我们在观察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时,必须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观察当代中国的问题,没有世界历史的眼光,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应当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如下的话:“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但是,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sup>[14]</sup>这种矛盾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是以保持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为条件的。它们阻塞了这些国家经由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富强的途径。这已经由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发达国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马克思与查苏利奇的通信。1881年2月,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他能说明一下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马克思指出:他在《资本论》里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一切决定于具体的条件。他认为,由于农村公社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东西,俄国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所以,如果其他条件具备,“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sup>[15]</sup>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有俄国革命”,必须对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采取积极的态度。尽管在事实上俄国的农村公社并没有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思想,对于观察俄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仍然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后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更说过:“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sup>[16]</sup>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有启发的。

俄国曾经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直到1913年,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42.1%,农业占57.9%。虽然如此,列宁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在十月革命中,列宁胜利地领导俄国人民实现了这个转变。1923年,他写了《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一书中,曾经认为列宁的上述理论“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即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在他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是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的。对此,列宁回答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



(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应当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革命时机成熟,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制度,以便为生产力的提高发展创造前提。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呢?列宁认为,没有。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sup>[17]</sup>在这之前,正是按照上述思想,列宁在论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时还直接说过:“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sup>[17](p.279)</sup>

由此可见,认为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之前绝对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毛泽东在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伟大的事业时,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的。他还结合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提高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sup>[18]</sup>这个一般规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适用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机器生产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据此,毛泽东指出,“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sup>[18](p.132)</sup>毛泽东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应当有步骤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经历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1951年,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毛泽东同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时就“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据当事人回忆:“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sup>[13](p.191)</sup>

应当指出,毛泽东虽然肯定在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实现以前,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可以长久地停留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sup>[19]</sup>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

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sup>[3](p.432)</sup>他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事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且在有生之年,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经过许多艰难和曲折,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观点是同列宁、毛泽东的观点相一致的。1977年10月15日,他在同加拿大林达光夫妇谈话中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sup>[20]</sup>邓小平在这里所阐明的必须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些人正是以这种庸俗的生产力论为主要的思想武器,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中国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很明显,为了科学地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我们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 五、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标准

1949~1956年,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凯歌行进的年代。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最初七年,称作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共中央在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是计划用10~15年来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而在实际上,从1953年算起,只用了4年,加上1949~1952年的3年,也只用了7年,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不是说明这项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原则性的错误呢?应当指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参照苏联的经验制定出来的。这个计划规定的时限,并不科学,因而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个规定就不能作为我们衡量社会主义改造的是非得失的标准。

这条总路线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提出的工业化标准(即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是太低了。毛泽东后来说过,我国要成为发达的工业强国,大约需要50~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估计,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所以,即使我们在这15年间工作一直干得很出色,什么错误都不犯,到1967年,我国的经济虽然会得到比后来实际在1967年得到的更大一些的发展,但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也还会有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中国在那时也还只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不可能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的话,就用原定的15年时间,也是不应当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见,事情的要点,并不在于是15年还是四五年,而是在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个角度来说,15年的时限就不是不可超越的了。为了判断这个时限是否可以超越,我们有必要把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作一点分析。就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苏联并没有用 15 年的时间，因为那里的资本家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办法，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不久，政府就把资本家的企业没收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虽然是大大提前了的，但比起苏联来，我们花的时间要长得多，工作也要细致得多。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苏联从 1917 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 1937 年完成农业集体化，一共用了 20 年。但是，实际上，苏联 1917~1929 年这 12 年间，基本上没有搞农业集体化。1929 年时，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还不到 1%。苏联大搞农业集体化，是从 1929 年开始的。1930 年 1 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决定，要求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应在半年或一年内完成，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应在五年计划期间完成集体化任务。而结果，到 1930 年 3 月 1 日，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就达到了农户总数的 56%；1934 年，集体农庄已经拥有全国农户总数的 75%、耕地的 90% 了。这就是说，半数以上的地区，集体化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其余大部分地区，也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与苏联相比，第一，我们合作化的基础比较好，合作化的高潮不是突然到来的。合作化高潮到来前夕，1955 年 6 月，全国农户的 60% 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全国农户的 14.2% 已经组织在农业社里面了。第二，我国各地的合作化都有一个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的过程，不是用行政命令限期完成的。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每个乡都已兴办了若干个农业社，这些社都办得比较好，它们不仅使广大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且为农业社的大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第三，我国大搞农业合作化，是从 1953 年开始的，到 1956 年完成，也用了 4 年左右的时间，并不比他们短多少。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粮食大幅度减产，牲畜头数也锐减。而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是逐年上升的。由此可见，根据苏联的经验，以我国是不是按照原定的 15 年期限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衡量进行这项工作是否适当、进展是否健康的标准，是不妥当的。当然，这项工作有时在有的问题上确实是急了一些，但这是方法、步骤上的缺点，不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

这是我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下面我想回答另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且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复归，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还能说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吗？

问题的要害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否在实际上等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占据领导地位，但在开始时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这种私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是逐步被公有经济取代的。而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即 1952 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 19.1%、合作社经济 1.5%、公私合营经济 0.7%、个体经济 71.8%、资本主义经济 6.9%。就是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 78.7%，占到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 1956 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 32.2%、合作社经济 53.4%、公私合营经济 7.3%、个体经济 7.1%、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 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一个时期相对下降，但这种主体地位本身，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

是不允许动摇的。

第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激化,但是主要的矛盾已经是生产的发展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矛盾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sup>[21]</sup>我们必须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由于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又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既要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时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果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阶级矛盾就会激化,社会稳定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就难以集中力量去从事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告诫我们:“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sup>[22]</sup>这个意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由此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是极端重要的;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妥当的。

在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之后,我想着重谈一谈究竟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改造的是非得失这个问题本身。

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衡量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否正确和必要,主要的标准应当是看这种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破坏作用。我们看到,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期间,即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比私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营业额比1955年增加了15%。又比如,农业生产在这期间基本上也是逐年上升的。1956年,农业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还是增长了4.9%,其中粮食比1955年增产4.4%,稻谷、小麦、薯类、烤烟、茶叶等的产量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57年的生产指标。畜牧业的情况稍差一些,但也没有发生农民大批宰杀牲畜致使畜牧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这些事实生动地表明,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我们尤其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1978年的20多年间,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由于党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定要发生的),整体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在这期间,我们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

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也还是相当快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810亿元,1978年为5634亿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1952年为349亿元,1978年为4237亿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461亿元,1978年为1397亿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7%。1957年和1978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动情况是:谷物由第3位上升为第2位,棉花由第2位变为第3位,猪牛羊肉由第2位变为第3位,化学纤维由第26位上升为第7位,布由第3位上升为第1位,煤由第5位上升为第3位,原油由第23位上升为第8位,发电量由第13位上升为第7位,钢由第9位上升为第5位,水泥由第8位上升为第4位,硫酸由第14位上升为第3位,化肥由第33位上升为第3位。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上升了。这些事实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应当而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动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显示。

中国原本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参引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 [4]《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60页。
- [5]《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 [6]《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41页。
- [7]《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 [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页。
-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697页。
- [10]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211~212页。
- [1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0页。
-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8页。
-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 [2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experiencing difficulties in its development: weak theoretical studies, uncertain disciplinary status and liability to question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ng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the solid Marxist foundation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uniqu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New Republic open up a good prospect for it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research qualities.

**Keywords:**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iography, predicament, prospect

\* Related Chaining \*

The First High-level Forum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Conference of Chinese Oral History Was Held in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 (95)

\* Academic Review \*

**The Latest Progress in Studies on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A Summary of Papers o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Presented at the 2004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 WU li(101)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2004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summary

\* National History Lecture \*

**A Reevaluation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 SHA Jian-sun(103)

**Abstract:**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was a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the economic front, a great change from private to public ownership in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the greatest and most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ropos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was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was transitional in nature and 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put forwar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as precisely a reflection of this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A scientific appraisal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alls for a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the vulgar theory of productivity. The main criterion for judging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s whether the changes in productive relations promoted or obstruc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new democratic society,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 Notes on National History \*

**An Inquiry into the Setup of Classified Items under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ccording to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in Chinese Libraries”** ..... SHI Zhen-hong(116)

**Keywords:**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in Chinese Libra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setup of classified items

**Argument Extracts** ..... (118)

\* Overseas observation \*

**The model of China and experience of China** ..... (120)

**The western Scholar’s opin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 ..... (121)

**Subject index of 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 (123)

Translator: LIU Rui-xiang